

总主编 刘泽华

中国政治思想通史

先秦卷

刘泽华 著

总主编 刘泽华

中国政治思想通史

先秦卷

刘泽华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政治思想通史·先秦卷/刘泽华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300-19394-6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政治思想史-中国-先秦时代 IV. ①D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6472 号

总主编 刘泽华

中国政治思想通史·先秦卷

刘泽华 著

Zhongguo Zhengzhi Sixiang Tongshi · Xianqin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70mm×240mm 16 开本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35.75 插页 3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634 000 定 价 10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序

这套九卷本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终于出版了，关于这套书的旨趣，在综论卷中已有详尽的论述，不再重复。这里只说几句有关的题外话。

1949年以前政治思想史的著作还是比较多的，这与当时很多高等院校设有政治系以及社会热烈议论政治有极大关系。1952年院系大调整之后，随着政治系基本被取消和政治一元化的强化，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也随之被边缘化，只在哲学史、思想史中有一点点观照。据我所知，只有极少数几位还默默坚守在这个领域，且主要是近现代史，集中在中国人民大学，由何干之主持，接续了香火，功莫大焉！

作为一门学科重新启动，应该说是与20世纪80年代陆续恢复的政治学学科设置和倡导社会思想解放相伴。

就我个人来说，20世纪60年代初，初涉中国思想史时读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他在“序言”中说，“所谓‘百家言’者，盖罔不归宿于政治”，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由此想到，研究历史不研究思想史是极大缺憾，而研究思想史不关注政治思想，则无所归。后来又读到章太炎在《国学概论》中说：“周时诸学者已好谈政治，差不多在任何书上都见他们的政治主张。……中国人多以全力着眼政治。”钱穆当时是被批判的代表人物，但他说的中国的士人以政治为宗教，对我也很有启发。

中国历史进程中政治的作用太大了，君主对所有臣民和整个资源具有最高的掌控权，王权支配社会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与之相应，政治思想必然处于社会观念的主导地位，而王权神圣则是其核心。因此不研究政治思想史就很难解析中国历史的真谛。

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在政治思想史领域盘桓，而反思“文革”中封建主义观念登峰造极的大泛滥，又给我以“使命”感。1984年拙作《先秦政治思想史》出版了，我自认为此书突破了把政治与阶级性等同的框框，提出政治不仅有阶级性，还有社会性。全书没有给任何一位思想家戴阶级的帽子。同时还提出，中国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即是君主专制主义，先秦诸子争论的主流是实行什么样的君主专制主义，这铸就了中国传统政治观念的基础。应该说这两个主要观点对后来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有相当大的影响，也引起了相当多的争论。

有两次会议对推动政治思想史研究起了明显的作用：一次是1985年在苏州大学召开的第一次“中国政治思想史学术讨论会”；另一次是1987年在吉林大学召开的第一次“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学术讨论会”。承办者都是政治学系，我作为行外人（历史系）也忝列发起者之中。

政治思想在学科上属于政治学，尽管我一直把主要精力用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但我置身于历史学，这样就出现了学科与人身归属的矛盾。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一直想申请一个多卷本的项目，由于项目在政治学范围内，而我人却在历史学，历史学又没有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项目，因此两次申请皆因学科畴域等问题而被否决。其实我完全有机会移身到政治学去，但我的根底在历史学，不能为项目移身，又不能更改我的研究方向，只好蹒跚地坚持走自己的路了。

说实在的，要想搞大一点儿的项目、吸纳较多的人参加，没有必要的资金支持还真的有很多难处。所以搞多卷本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设想一拖再拖，但我从来没有灰心。相信机会会有的，但我的原则是“不期而遇”。

2005年前后教育部要在文科组建创新基地，可我已临近古稀，即将退休。我是一个“好事”之徒，退休与否与做事不相干，我提议组建一个以“思想与社会”为名的基地，此意得到南开大学学校领导、历史学院和文科各系的支持。说来也巧，竟然被批准了。我有幸被诸位老弟推举为首席专家，于是组织撰写多卷本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机会真的来了，可以说是又一次“不期而遇”。

我虽任总主编，起了一点儿发起和组织的作用，也举行过多次研讨会，但参加者都是长期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与教学的专家，其中多位是博士生导师，对如何撰写由他们自行其是。我所做的主要是催促进度。由于他们都是忙人，催促的效用也有限，直到2012年才把稿子集齐。

我们一群人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各位同仁有过愉快的合作经历，这里仍需深深感谢他们再一次的鼎力支持和理解！从扶持学科发展来说，他们承继了何干之的精神！

刘泽华谨记
2013年岁末

目 录

导 论

第一章 商代神佑王权的政治观念

第一节 上帝和祖先崇拜及其对商王的庇佑	23
第二节 “余一人”和王权专制观念	28
第三节 几个重要的政治概念	30
第四节 结语	33

第二章 西周敬天保民与天下王有的政治思想

第一节 周公的“革命”思想	35
第二节 “天子”与专制主义观念	43
第三节 《尚书·吕刑》以刑理乱与用刑理论	48
第四节 西周后期政治调整思想	50

第三章 春秋时期由重神向重人转变的政治思想

第一节 春秋时期政治思想概论	56
第二节 几个代表人物的政治思想	87
第三节 《尚书·洪范》的政治思想	98

第四章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转型与政治思想不同流派的争鸣和政治理性的发展

第一节 战国七雄的建立和各国的变法运动	102
---------------------------	-----

第二节	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	103
第三节	战国时期的社会各阶级	105
第四节	政治制度和赋税徭役制度	111
第五节	兼并战争和秦的统一六国	116
第六节	不同政治流派的争鸣与政治理性的发展	117

第五章 儒家以伦理为中心的政治思想

第一节	儒家概述	128
第二节	孔子以礼仁为中心的政治思想	136
第三节	《中庸》《大学》的修齐治平的人治思想	161
第四节	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竹简中几篇儒家著作的政治思想	167
第五节	孟子的仁政思想	171
第六节	荀子的礼治思想	192
第七节	《易传》的应变政治思想	214
第八节	《礼记》以礼乐治国与君主专制主义	224
第九节	《周礼》中的国家体制思想	239

第六章 法家以法、势、术为中心的政治思想

第一节	法家概述	251
第二节	李悝的变法与法治思想	255
第三节	慎到的势、法、术思想	258
第四节	申不害的术治思想	268
第五节	《商君书》的耕战和法治思想	272
第六节	韩非以“力”为基础的绝对君权的政治思想	289

第七章 道家以法自然为中心的政治思想

第一节	道家概述	311
第二节	《老子》的无为政治思想	317
第三节	杨朱的贵己及其童子牧羊式的政治主张	334
第四节	《庄子》的自然主义政治思想	339
第五节	马王堆《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黄老政治思想	361

第八章 墨子以“尚同”推行“兼爱”的政治思想

第一节	墨子、墨家学派和《墨子》	375
第二节	刑政、政长的起源和社会政治的基本矛盾	376
第三节	“兼相爱、交相利”与平等观	379
第四节	尚同说与君主专制主义	383
第五节	尚贤说与上下调和	387
第六节	节用说与发展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生产	390
第七节	“非攻”与“是诛”	391
第八节	结语	393

第九章 名家正名实的政治思想

第一节	名家概述	394
第二节	《邓析子》的“刑名”无为思想	396
第三节	《尹文子》的刑名法术思想	402
第四节	惠施的去尊思想	408
第五节	公孙龙以“离”为本的名实观	414

第十章 阴阳家以天人配合为特征的程式化政治思想

第一节	阴阳、五行说概述	420
第二节	邹衍五德终始下的政治循环理论	422
第三节	《月令》天人相应的政治程式化理论	424
第四节	结语	426

第十一章 农家许行自食其力的均平思想

第十二章 《管子》“轻重”诸篇的国家垄断商业以治国的理论

第一节	关于“轻重”诸篇	432
第二节	以“轻重”治国说	433
第三节	关于市场规律的认识与理论	436
第四节	国家垄断货币和主要商品	440
第五节	操纵市场，从中渔利	441

第六节	以经济实力为基础解决社会各种矛盾	445
第七节	结语	448

第十三章 《管子》融合各派的政治思想

第一节	《管子》与各派的融合性	449
第二节	法家派兼收道、儒的政治思想	452
第三节	道家派兼收法、儒的政治思想	480
第四节	阴阳家派的务时寄政与以水治国论	487

第十四章 《吕氏春秋》兼收并蓄的政治思想

第一节	吕不韦和《吕氏春秋》	492
第二节	关于政治法自然和随时变的思想	495
第三节	关于君臣的论述	498
第四节	关于对民的态度与理论	502
第五节	关于无为政治思想	504
第六节	关于义兵与统一天下的思想	507
第七节	结语	508

附录	先秦政治思想研究状况概述	509
主要参考文献	555
后记	561

导 论

中国政治思想从何时开始，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本卷从有文字记载为始，实际是从殷王盘庚为始。《尚书·盘庚》应该说是很成熟的政治文献。在此之前无疑还应有较长的历史发展演进时期，但由于没有文字资料，只能阙如。如果从考古所揭示的事实看，我想还是可以做某些描述的，但这需要有很深入的考古知识，而我无能焉，作为一个问题，俟有关专家补阙。

商周时期，政治思想的基本特点是神佑王权。殷周之变虽然没有改变这一思维模式，但周公提出的“以德配天”和“敬德保民”引导政治趋向社会实际，为后来的政治思想世俗化做了铺垫。西周后期与春秋时期的社会变动，把政治从“敬天”的盖子下解放出来，政治直接面向社会实际，“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把问题说得十分明白了。

在这一转变中，老子与孔子有特别值得称道的象征性意义。时下学界把他们称为“人文”思想的两位巨擘。老子的贡献是把人还给了自然，孔子则把人还给了社会，以他们两位为开端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诸子争鸣时代。百家争鸣导致了社会观念的转型，即由“神文”向“人文”的转变。这里说的“人文”与现代意义的“人文主义”不在一个层面上，而是《易传》所说的：“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传·彖传上》）“人文”指的是社会秩序、礼仪和社会生活。

从老子、孔子开始，到秦统一，在两百多年的时间内，出现了数以百计的思想家。这一场认识运动与社会转型相伴，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①，既是空前的，又是绝后的。这场认识运动的总结果，是开拓了认识新领域，打开了新思路；把历史长期积累所形成的思维方式上升为理论，为古代华夏族提供了思维模式；多种思想都形成了一定的体系，这些体系直到近代西方思想传入之前，一直

^① “封建”一词不是分封制的原始含义，而是指成俗的“社会形态”的含义。在没有找到更合适的概念取代它之前，我们还暂时使用它。下同。

为后来者所宗所本，除佛学体系外，几乎没有能超出这些认识体系另创立的新体系。因此可以说，这个时期的认识总和奠定了其后两千多年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在这场认识运动中，政治思想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先秦诸子除极少数人外，首先都是政治家，各种各样的认识基本上都是围绕政治展开的。正如梁启超所说：“所谓‘百家言’者，盖罔不归宿于政治。”^①章太炎先生也说：“周时诸学者已好谈政治，差不多在任何书上都见他们的政治主张。……中国人多以全力着眼政治。”^②因此可以说，先秦诸子的争鸣，首先是一场政治认识运动。近人由于对当时社会性质有不同的认识，因此对这场政治认识运动也有各式各样的社会定性方式，在一个时期占主流的是阶级定性。定性分析有其精审的一面，但在目前，无论哪一种说法，一时都难以把问题说清楚。因此我想，与其斤斤计较某某代表某某阶级，不如稍微超脱一点，从总体上进行估计。这个时代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方面这是一个社会变革的时期，充满了变革与反变革的斗争；另一方面，我们又难以确切地分辨出变革与反变革的社会阵营。在同一类人中，如诸侯和宗族贵族，既有主张变革的，也有主张保守的。这种情况是由当时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的错综复杂所决定的。思想家生活这样的环境中，他们的认识便反映了这种复杂的情况，从社会属性上很难判明谁是什么阶级的代言人。不过在难分难辨之中，又有十分清晰的轮廓，除少数（像农家许行等）外，绝大多数思想家都是为当时的统治者和剥削者出谋划策，为了“干世主”。因此又可以说，这场认识运动的主流是统治者自我认识运动，目的是给统治者寻求政治出路。批判是通向彼岸或到达新境界的桥梁，是自我认识的必备武器。当时的思想家们对现实生活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剖析和批判，目的是为了把社会引向他们所理想的境界。这些思想家具有超人的胆量，他们敢于把整个自然、社会和历史都收入自己眼帘之中。他们的眼光像一把把解剖刀，对整个社会进行了剖析。他们放眼全社会，纵横数千里，上下数千年，社会的一切，都纳入自己认识对象之中。正因为有这种气魄，认识才格外深刻。下边概括叙述几个政治认识大局性的问题。

一、关于政治哲学的认识

殷周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是神祐王权，一切政治活动都要从神（祖）那里获得说明和支持，像周公这样的杰出人物也不例外。天主宰一切，“命哲，

①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2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

② 章太炎：《国学概论》，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命吉凶，命历年”（《尚书·召诰》）。神明政治在春秋战国虽然仍有广泛的影响，但多数人把思维的触角从天国转向了社会现实，政治思维转向世俗化。这样一来，政治思想发生了巨变，现实主义的思考方式取代或压倒了神明主义。先秦诸子在开列具体的政治处方的同时，深入探究了政治原理，力图从哲学上阐明问题，从而把政治认识推向高峰。在探究政治原理时，他们不囿于政治本身，而是从各种事物对政治的制约关系和客观事物的运动规律中寻求政治指导原则，把政治思想的理性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具体而论，主要是从天人关系、人性、历史与现实关系以及事物的矛盾规律等方面来寻求政治指导原则，这些就属于通常说的政治哲学问题。人们对什么是政治哲学有不同的理解，这里不去讨论。在我看来，政治哲学所探讨的是：政治为什么是这样及政治的合理性与价值问题。政治哲学也是以历史的形态存在，下边就当时的政治哲学问题作一简要分析。

（一）天人关系与政治

天在西周是至上神。春秋以降，它逐渐变为一个具有多种含义的模糊观念，在不同情况下和不同意识中，或指神，或指客观自然，或指两者的混合，或指人类的生理机能，有时又指超乎人们意志的必然性。在同一个人的著述中，天的含义也多随论题而异。先秦诸子几乎没有哪一个人只从一种意义上严格使用“天”这个概念。比如孔子说的“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畏天命”（《论语·季氏》）。这里的天，无疑属于神秘主义。他又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这里的天，显然指客观的自然过程，又毫无神秘主义色彩。老子是从理论上把天自然化的大师，然而就在这位大师笔下仍留有神秘主义的尾巴，如“天将救之，以慈卫之”（《老子·六十七章》）、“天之所恶，孰知其故”（《老子·七十三章》）就有神秘主义色彩。荀子被公认为是先秦的唯物主义者，然而在某些论述中，“天”仍有神秘主义的味道。尽管天是一个含糊的、容量很大的概念，但对天的认识又形成了一个共同意识，即凡属超乎个人意识之外的东西，都可称之为“天”。人把自己同自然区分开来是认识上的划时代的飞跃，但是只沿着这一方向走，同样会从一个方向走进死胡同；只有当人们不仅认识到自己与自然相区分，同时又认识到人和自然的统一，这才算进入了辩证的认识领域。先秦诸子广泛讨论了天人关系，既认识到了两者的区别，又深入地探讨了两者之间的联系，特别是着重论证了自然对人类生活的制约关系。他们提出，人是天地自然的产物，天地自然又为人类提供了生存条件和环境，“天地者，生之本也”（《荀子·礼论》）。由于诸子对天人关系持有不同的认识，从中得出的政治原则也不尽相同。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三种不同的思路。

一种是政治法自然思想。先秦许多派别和众多的思想家，从不同点出发，都主张把法自然作为政治的基本指导原则。政治法自然思想早在春秋时期已有不少人作了初步论述。比如子产讲的“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已把政治法自然的思想说得相当清楚了。在理论上更明确提出“法自然”的是老子。老子此论一出，犹如壅塞之水一发而泄，相类似思想和理论滚滚而来。除了道家将其发扬光大外，一部分儒家、法家也多有阐发，特别是阴阳家从“务时而寄政”（《管子·四时》）出发，把天人关系归纳为固定的程式，达到登峰造极之境。先秦诸子法自然思想的表现各式各样，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遵循自然规律。先秦诸子用以表达自然规律的概念很多，有“道”“常”“则”“理”“节”“度”“数”“时”“势”“必”“序”等。这些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人“莫之能损益”（《管子·乘马》）。他们把遵从这些规律通称为“法天地”“象四时”（《管子·版法解》）。《管子·五行》说：“通乎阳气，所以事天也。经纬日月，用之于民。通乎阴气，所以事地也。经纬星历，以视其离（读如‘列’）。通若（此也）道，然后有行。”基于上述认识，许多人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孟子·离娄上》）“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成必败。”（《管子·形势》）“夫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韩非子·解老》）

第二，政治举动与天地运转相配合，并用行政手段监督和保证人与自然保持生态平衡。许多人主张要把自然天道规律以及遵循自然规律的人事行为用政令法律形式加以规定，迫使所有人遵从。这集中表现在对“四时之政”的论述上。例如，春天是万物复苏萌发时期，与之相应，春天“毋杀畜生，毋拊卵，毋伐木，毋夭英，毋拊竿，所以息百长也”。春天是一年生计之始，为了保证农播，要“赐鰥寡，振孤独。贷无种，与无赋，所以劝弱民”。“所以建时功，施生谷也。”（《管子·禁藏》）自然为人类提供了生活之源，“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荀子·富国》）。但是人对自然索取过多或索取不当，反而破坏了自己赖以生存的条件。墨子为此曾忧虑重重。荀子批评墨子是“私忧过计”，但墨子的忧虑还是颇有道理的。这种忧虑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特别是阴阳五行家，他们详细具体论述了人类向自然索取不仅要有时，还要有节。山林开禁之时也不能任意而为、滥砍滥伐，以保证来年林木的生长。

第三，一些人还提出，人类社会的结构是从自然结构中引申出来，或模拟自然而成的。“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

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易传·序卦》）这种天地与社会、父子生成关系虽然十分粗糙，但其中包含有朴素的自然与人事具有统一性的思想，并借助这种统一性理论，把社会君臣父子等级之分自然化。所以又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易传·系辞上》）乾代表君、父、夫等支配方面；坤代表臣、子、妻等被支配方面。《管子·四时》把自然与人事分为五个层次，即道、天地、德（五行之德，指一年四季的不同性质和特点）、政（指由五行而引出的必行的政治规定）、事（指人事）。作者认为这五者是一个顺向依次制约关系，即“道生天地”，“道生德，道生正（政），正生事”。这样一来，当时人间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原则都是天地自然的派生物，天地自然不变，这种社会关系也就永远不变。

第四，政治的基本手段脱胎于自然。政治手段有千种百样，最终不外德、刑两手（又称赏、罚，宽、猛，文、武等）。一些思想家认为，德、刑也是从自然生杀荣枯中引申出来的。春夏生物谓之德，秋冬肃杀谓之刑。天不废生杀，政亦不能废德、刑。德、刑两手应像四时循环那样，交替使用。“是以圣王治天下，穷则反，终则始。德始于春，长于夏；刑始于秋，流于冬。刑德不失，四时如一。”（《管子·四时》）

第五，天道自然对万物都是平等的，无亲无近，无偏无私，“公”字当头。政治要向天道看齐。由此而引出一个基本原则，这就是尚公而抑私。圣君“任公而不任私”，“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也”（《管子·任法》）。“圣人若天然，无私覆也；若地然，无私载也。私者，乱天下者也。”（《管子·心术下》）

第六，先秦不少思想家主张无为政治。无为政治的理论基础是法自然。关于无为政治问题下边再论述。

以上讲的政治法自然，其中要点是强调人与自然相契合，一切政治行为要建立在顺从自然的基础之上。

与上述法自然不同的另一种思想，是绝对的自然主义。从思路上看，这些人也是法自然，但他们所谓的法自然与前边的思想有本质不同。他们把事情推向极端，主张“天而不人”（《庄子·列御寇》），完全回到自然中去。这种思想发端于老子，形成于庄子及其后学。在老子那里，天与人的统一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天地自然与人事的本源都是道，纷纭万物万事都是道的外化现象；其二，道是支配自然、人事的内在规律；其三，人能够了解和把握天道的规律，并应该宗奉法自然的方针，这样便可以治天下，“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老子·三十七章》）。由于老子基本倾向在自然方面，因而对人事不仅表现出悲哀，甚至

是厌恶和憎恨。老子后学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他们把人本身也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的自然性，通常称之为“性”，人的自然性属于天，即自然的范畴，是整个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是人的意识、能动作用和社会关系等，这些属于社会性。在庄子及其后学看来，人的社会性与自然性是截然对立的，社会性是破坏人的自然性的产物，社会性越发展，对人的本性破坏越厉害。为了防止这种破坏，他们提出了“反性”“修性”“循性”“反情性”等一系列命题，要求人类回到自然中去，“与天为一”（《庄子·达生》）。所谓“与天为一”，就是把人完全融化在自然之中，不应因是人而有高于万物的情感。达到这一境界的妙道是“忘己”和“无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庄子·天地》）。从上述认识出发，在政治上作者们主张“天而不人”，即一切顺天，取消人的能动精神。又说“本乎天”（《庄子·秋水》），“工乎天而拙乎人”（《庄子·庚桑楚》）。依据这些原则，首先，人类就不应该提出“治”的问题，最理想的世界是“不治天下”；其次，如果“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庄子·在宥》）。无为的真谛是顺自然。顺自然，就要使民“安其性命之情”，为此，至关紧要的是“无擢其聪明”（《庄子·在宥》）。庄子“天人为一”的思想，不是要人们了解自然，掌握自然，在顺应自然中改善人的生活，而是要人融化于自然，消失在自然之中，从而人也不再是人。人获得了自然的自由，却失去了社会创造的自由，人只不过是与牛马异形的一种动物而已！

再一种看法是既主张法自然，又要有所分，这种思想以荀子为代表。荀子提出“天人之分”“天行有常”“能参”“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等，把对天人关系的认识推向新的高峰。“明于天人之分”是把法自然引向科学和自觉的前提。荀子在“分”上作了细致的分析：人之外的自然界属于天，人本身仍需要再分析。荀子认为人的生理情欲和功能也属于“天”的范围，故称之为“天情”“天官”“天君”（《荀子·天论》）。荀子指出，天地自然以及人的生理功能是不依赖人的主观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对这些规律，荀子既不赞成违抗，又不赞成消极的顺应，他提出应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积极地配合、利用，乃至加以控制和改造。他提出的“能参”“制天命而用之”以及“起伪”“化性”（《荀子·性恶》）等主张，就是这个意思。基于上述认识，在政治上既要遵循自然规律，又要勇于进取，在顺应中以求利用，在利用中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他豪迈地提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荀子·天论》）实行德政，“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馁之患”（《荀子·富国》）。政和可以战胜天灾。荀子的这一见解是杰出的。因此，可怕的不是天灾，而是败政！

天人关系是一个哲学问题，又是一个实际的政治问题。自然界是人赖以生存的条件和活动的前提。人们通常只把政治理解为解决社会关系方面的事，在阶级社会则又说成是处理阶级关系方面的事。这种说法有它的道理，然而是不完全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靠自发的方式来处理的，也不是个人的私事。这一点荀子早就指出过。人是靠“群”在自然中生活的。人和自然的交往，必须通过政治手段加以规范，才能保证人与自然之间取得平衡，才能维护人类生存的条件，才能更好地利用自然。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会直接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历史上的社会组织，包括后来的国家，从来不是只管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都把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自己的重要活动内容之一。在阶级社会，政治的阶级性是明显的事实，但政治又不全然是阶级的，处理天人关系问题就不能全部进入阶级范畴。在中国古代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条件下，天人关系问题在政治中有更突出的地位。农业依赖自然是人所共知的，破坏了天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必然导致社会经济灾难，必然会引起社会问题。当时的思想家们从天人关系着眼探讨政治的指导原则，应该说是登高望远之论。

这里要补充一句：传统中的“天”从来不是一个纯自然的观念；相反，一转眼就充斥着神秘主义内容。上边的论述只是就其自然含义说的，天人之间的神秘关系完全从略了。就实而论，传统中的天人关系的自然性与神秘性是交融或纠葛在一起的，可以说难剪断，理还乱。但有一点：无论天的自然性还是神秘性都超越了人的主观性，人都要顺天、法天。

（二）人性与政治

春秋以前的政治面对着神，凡事都要从神那里获得启示/指示。春秋以降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成为政治议题的中心内容，政治成败的原因蕴藏在人自身。正如史闾所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寥寥几字，点明了两种不同的政治认识。当时头脑稍微清醒的政治家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民之向背是政治成败的关键。到了战国，这一类的论述不仅充塞了思想家的著作，而且变得更深刻了。民为政本是这种思想的最高概括。“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也。”（《晏子春秋·问下》）问题点得很透。但是事情的内在联系是什么呢？芸芸众生千姿百态的举动是以什么为动因的呢？作为一个政治家怎样才能把握住民众的动向？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敏锐的思想家们提出了民性、民情、人性等一系列问题，企图找到事情的奥秘。综观先秦诸子有关人性问题的讨论，不下十余种说法。有的说人性恶，有的说性本善，有的说无善无不

善，有的说好利，有的说有恶有善，等等。先秦诸子有关人性问题的讨论绝不是什么先验的命题，也不是什么纯抽象问题。先秦诸子有关人性问题的讨论是把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并由此探讨了人的价值、人们关系的本质以及人生观等问题。许多政治家和政治思想以自家的人性理论为基础论述了自己的政治理论和政策。关于这一方面的问题，在本丛书“综论卷”中作了较详细的讨论，这里不再重复。

总之，人性问题是探讨人的本质的深刻命题，是关于对人的认识与理论的核心。今天看来，这个命题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在当时，它却是认识的高峰。尽管诸子对人性认识多有差异，得出来的政治观点泾渭分明，但围绕人性的争鸣，形成了一种综合性的政治文化观念，这就是：政治应把人作为中心对象，一切政治思想应该从对人的认识中产生，而不应从神灵那里求得指示。各种不同的人性论是不同政治主张的出发原点和依据，尽管诸子对人性的看法有很大的差异，但都把入作为政治的基点。中国的中世纪没有走向神权政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认识上考察，应该说先秦诸子对人性的充分讨论起了重大作用。

（三）历史观与政治

政治思想家、有作为的政治家比任何人都更加注重历史。认识历史、认识现实、认识未来，是认识社会的三个环节，并构成一个循环圈。正如《吕氏春秋·长见》所言：“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故审知今则可知古，知古则可知后。古今前后一也。故圣人上知千岁，下知千岁也。”就这一段文字而论，是有缺陷的（把历史看成静态的重复），但作为方法论是极有价值的。只知古而不知今，必陷于昧；只知今而不知古，必陷于陋；不知古今而言未来，必陷于妄。这三者是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大忌。先秦的政治思想家都十分重视研究历史，并把历史观作为自己的思想支柱之一。综观先秦诸子，他们的历史观大体可分为如下四种不同类型。

一种类型的观点认为，历史是进化的和不断变动的。法家、轻重家、《易经》以及《吕氏春秋》中的一部分内容，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历史进化和不断向前演进的历程。特别是《商君书》的作者和韩非，他们用分期的方法描述了历史的进化过程，并对进化的原因进行了发人深省的探讨。他们以历史进化理论为依据，主张政治要随时而变，而且历史上的政治从来就是如此，先王“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在他们看来，历史上的一切成法、传统、习俗、价值观念等，都应在现实面前经受检验，当留则留，当弃则弃，决不为历史传统所囿。他们提出：“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